

『讓該撒的歸該撒？』

～看 1917-88 年俄羅斯正教與蘇維埃共產政權的關係』

辛惠蘭 Mdiv 2

A. 前言

記得九七回歸前夕，很多香港教會都在不安之中；教會可以保存自己的身份嗎？還可以自由傳道嗎？時至今日，這些擔憂大都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如何跟國內官方機構溝通合作的議程；平信徒固然安於參與「三自教會」的聚會、教會聯會的領袖，更積極跟國內的「統戰部」、「兩會」聯絡交往、就是神學院，亦樂於在官方畫定的範圍下活動，處處看到樂觀、合作的氣氛。

問題是，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以基督為主，跟以國家為絕對的無神共產政權，其實有着前題上的根本矛盾。面對敵視宗教的政策，教會應採取妥協支持的態度，還是站穩先知的角色而作出批判？當中原則似乎顯而易見，但到實際處理，卻談何容易。

本文將把俄羅斯正教(Russian Orthodox Church)在革命後七十年中，與共產政權交往的經歷，因應當中的特徵，分成五個時期，討論正教會面對敵對政權壓逼的回應策略，評估當中的成效和引致的結果，希望能為上述問題帶來一點啟示，作一些反思。

讓我們先看看一些背景，以及為這時期的政府政策作一個鳥瞰¹。

B. 背景和政府整體政策

馬克思主義其中一個信念是，宗教是腐敗經濟秩序的不幸後果²，因為它是剝削階層用以麻醉群眾，使其逃避被剝削的痛苦的工具，「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以維持剝

¹本文內名稱的中文翻譯，如適用，將跟隨黃國維：：「赫魯曉夫政權下的俄羅斯正教」，【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三十七期(2004年7月)：189-209一文中的中文翻譯。

²Trevor Beeson, *Discretion and Valour*, revised ed.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2), 15.

削階級對人民的壓制。因此，如果蘇維埃政權要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它必須將宗教從社會消滅³。

而另一邊廂，俄羅斯正教一直維護前沙皇政府，從未跟國家分離⁴，亦無可避免地成為新政權打擊的目標，以去除這舊政權用於鎮壓人民的工具；況且，正教會當時得到近億人民的效忠，有完善的行政組織和超過五萬人的隊工，更是革命內戰以後，唯一能保持全國行政網絡完整並繼續運作的組織⁵，自然是波斯維克(Bolsheviks)完全控制國家的具大障礙。「教會必須被馴服或消滅」，是歷任蘇維埃統治者的既定思想⁶，而他們在這七十年間的宗教政策，都以削弱正教會挑戰政權的潛力為單一方向⁷。

因此，自革命成功開始，正教便一直在逼迫的圍困中，雖然力度在不同時期各異，但政府的態度是一貫的：不單要教會與國家分離，更要藉任何方法，破壞有組織的教會生活，消滅任何宗教信仰。

這構想在革命政府一上場，便已實行出來，在其名為「信仰和宗教會社自由」法令(1918年1月23日)⁸，規定包括(1)教會與國家分離;(2)學校與教會分離;(3)任何教會與宗教團體都無權持有自己的財產，無權充當法人;(4)現存教會和宗教團體的一切財產，都是人民的財產等等。這樣，教會在經濟上難免變得虛弱，亦不再有任何特權和權力，更喪失其法律地位。

而蘇維埃憲法亦愈來愈嚴苛，在1918年時，憲法還容許「宗教」自由，但到了1929年的宗教社團條例(Law of Religious Associations)，則變成了「宗教信仰」和反宗教宣傳的自由，意味着信徒有信仰但無宣教的自由，而教會亦成了只供宗教禮儀的組織；它可以進行崇拜，而在1943年後，也可以開辦神學院訓練神甫，以及作有限度的出版工作。但除此之外，其他活動均被禁止。

因此，所謂的政教分離，其實是單方面的：教會無權干涉國家的事務，但國家卻常常干擾教會的運作⁹。神職人員均不能參與慈善或社會服務，甚至不能給青少年開

³ William Fletcher, "Reductive Containment: Soviet Religious Policy",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 22, no.3 (1980): 487.

⁴ Andrew Evans, "Forced Miracles: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nd Postsovie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ligion, State & Society* Vol. 30, no. 1 (2002): 33.

⁵ William Fletcher, "Reductive Containment: Soviet Religious Policy", 487.

⁶ Trevor Beeson, *Discretion and Valour*, 19.

⁷ Zoe Knox, "Postsoviet Challenges to the Moscow Patriarchate, 1991-2001", *Religion, State & Society* Vol. 32, no.2 (2004): 88.

⁸ 赫克(Julius F. Hecker): 【俄國革命前後的宗教】(Religion Under The Soviet), 高驊、楊續譯(中國: 學林出版社), 頁62。

⁹ Roy Medvedev, Interviews", *Religion in Communist Lands* Vol. 5, no.4 (1977): 260.

辦主日學。神甫對群羊的牧養，只可透過講壇；而除了禮儀書，教會亦不能保有其他書籍，更不可分發單張；加上所有教牧人員，上至主教下至教區神甫，都必須經國家批准，才可工作，亦要受秘密警察的監視，連講道的每個細節，都被小心記錄，教會便成了疏離、互相猜忌的地方。

在 1920 和 30 年代，教會被大幅度關閉，還有大量神職人員和平信徒被送到監獄和勞改營，當中被處決或死於酷刑的，更成千上萬，不計其數。國家用以緝捕信徒和鎮壓教會的藉口，也層出不窮，包括為維護國家內外安全，甚至指控教士不事生產，破壞國家經濟等；而教會建築物，亦被指浪費維修、照明和燃料資源¹⁰。

與此同時，政府亦用盡各式反宗教的宣傳方法，除了在學校推行系統化的無神論課程，要求各校老師均為無神論者，推動黨的科學精神外，在校外則有“the League of Militant Atheists”等組織，推動一系列的反宗教宣傳運動，包括在 1920 年代舉行的街上巡行等¹¹。

C. 俄羅斯正教與國家的關係

1. 1917-25 年牧首狄康(Patriarch Tikhon)的對抗堅持

莫斯科牧首狄康，一開始便毫不保留地對波斯維克(Bolsheviks)採取不妥協的態度。他首先指示教會，要強硬阻止任何共產黨員沒收教會財產¹²，而在 1918 年 2 月 1 日，更咒詛革除那些「公開和偽裝的基督的敵人」和「無神的黑暗統治者」，此咒詛到最後都沒有撤銷或收回¹³。

而面對 1918 年法令所帶來的，對教會在經濟、教育和法律地位等的威脅，教會領導亦號召信徒保護教會，抵抗法令的執行，結果釀成大量的暴力和流血，經過整整一年，直至「紅白內戰」才慢慢平息¹⁴，而正教會亦從敵對政權，改為保持政治中立；或許狄康覺得，這樣完全敵對，對國家和教會都沒有幫助。但這種立場的轉變，並未消滅教會對政權的威脅¹⁵，而國家亦伺機削弱教會的影響力¹⁶。

¹⁰ Trevor Beeson, *Discretion and Valour*, 47.

¹¹ Timothy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new ed. (London: Penguin, 1997), 146-7.

¹² Trevor Beeson, *Discretion and Valour*, 59.

¹³ Timothy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150.

¹⁴ Trevor Beeson, *Discretion and Valour*, 59.

¹⁵ *Ibid.* 60

¹⁶ William Fletcher, “Reductive Containment: Soviet Religious Policy”, 487.

1922 年內戰帶來的饑荒，為國家打擊和分裂俄羅斯正教帶來機會。其實狄康早在 1921 年夏天，已向西方教會領袖要求援助，亦早於國家成立慈善基金，幫助災民¹⁷。而當國家在 1922 年 2 月要充公教會財物去幫助災民時，狄康亦願意合作，唯獨要求保留已經祝聖和聖餐的器具¹⁸，一些忠於狄康的主教，例如本加明都主教 (Metropolitan Veniamin)，甚至提出折衝方法，先由教會把聖物溶解，才予充公¹⁹。但事件始終為教會帶來災難，各地發生信徒阻止聖物被充公的暴亂，引致大量審訊，本加明都主教被捕處決，教會亦輸了一場宣傳戰，因為在群眾看來，教會只顧保護自己財物，而對數以百萬計災民的苦況視若無睹²⁰。

列寧沒收教會財物的行動，其實是其借俄羅斯正教內一群稱為「活的教會」或「恢復派」(Renovationists)的已婚教士，分裂俄羅斯正教的計劃的一部份。這群恢復派的特徵，在於跟無神政權妥協，借助政權的力量，在教會內推動改革，例如容許主教結婚等²¹。而當狄康因事件入獄期間，「活的教會」亦趁機叛離牧首，在國家協助下，奪取了一大部份的教區和差不多所有教堂，甚至在 1923 年召開會議，企圖解除狄康所有職權。雖然最後失敗，但至少令教會有一段日子被一分為二²²。

狄康在獄中經歷了甚麼，不得而知，但他因簽了一份「供認書」而得到釋放，出獄後亦緩和下來²³，卻是事實。此「供認書」的內容如下：「我在君主政體長大，我在監禁前一直受反蘇維埃份子的影響，我是敵視蘇維埃政權的。我明確和清晰地否認與外國的反革命份子和本國的擁護君主制度者並白色衛軍有任何聯繫。」²⁴

狄康簽署這供認書的原因，或許在於他擔心教會落入新的領導手中，會損害其福祉²⁵，但無論如何，狄康其實並無在供認書中，承認任何罪行，他只供認過去對蘇維埃政府的敵視和重提他政治中立的政策。

¹⁷ Dmitry Pospelovsky, "The Renovationist Movement in the Orthodox Church in the Light of Archival Documents",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 39, no.1 (1997): 94.

¹⁸ William Fletcher, "Reductive Containment: Soviet Religious Policy", 490.

¹⁹ Dmitry Pospelovsky, "The Renovationist Movement in the Orthodox Church in the Light of Archival Documents", 94-95.

²⁰ William Fletcher, "Reductive Containment: Soviet Religious Policy", 490.

²¹ Timothy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150.

²² William Fletcher, "Reductive Containment: Soviet Religious Policy", 491.

²³ Timothy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151.

²⁴ Trevor Beeson, *Discretion and Valour*, 61.

²⁵ Ibid.

狄康在 1925 年的死，來得突然和神秘²⁶，但綜觀他抵抗政權的經歷，雖然在 1917 年至 1923 年間，有 1,200 名正教神甫和 28 位主教被殺²⁷，但他始終得到教會中大多數人士的支持，以他受的苦等同殉道者²⁸。反觀借助政權勢力的「活的教會」，卻為差不多所有信徒棄絕，而當再無利用價值，也失去政府的支持，由 1922 年控制全國 66% 教區，跌至 1924 年的 30%²⁹，到最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完全消失。

2. 1925-43 年都主教沙基(Sergii)的妥協

狄康死後，大部份被狄康選定的牧首宗座「看守人」(*locum tenentes*)，都已被收監。最後政府容許地位較低的都主教沙基，成為牧首宗座看守人³⁰。

起初沙基都有跟隨狄康的政策，甚至在 1926 年 6 月 10 日的聲明，公開指出基督教和共產主義的矛盾；「我們不是在承諾協調那不能協調的，以及假裝把我們的信仰融入共產主義，我們會從宗教的角度維持我們的立場，即傳統教會的成員。」³¹

但在 1927 年，沙基突然改變態度。他在 1926 年 12 月至 1927 年 3 月入獄，而被釋放後，他在 7 月 29 日發出「效忠聲明」(Declaration of Loyalty)，指出政府對教會的不信任，是國外主教們對祖國的背叛所致³²，他還指出：「我們希望保持正統，並同時承認蘇維埃聯邦為我們的祖國，它的喜樂和成功，也是我們的喜樂和成功，它的失敗，也是我們的失敗。」³³

支持沙基的人，認為他只是在保護教會，他的行動是「無可避免的罪」(*necessary sin*)³⁴，而在 1990 年代為牧首的艾歷時第二(Patriarch Aleksii II)，在一個訪問中亦表示：「我們只能同情那晚的他。無論如何，他有兩個選擇：一是簽署；不然，數以百計已被拘捕的主教，將會被殺。... 今天我們可以說那份聲明充滿虛假，其目的卻是讓教會與政府，有一個正確的關係。」³⁵

²⁶ Timothy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151

²⁷ Trevor Beeson, *Discretion and Valour*, 37.

²⁸ 赫克(Julius F. Hecker)：【俄國革命前後的宗教】(*Religion Under The Soviet*)，頁 91。

²⁹ Dimitry Pospelovsky, "The Renovationist Movement in the Orthodox Church in the Light of Archival Documents", 102.

³⁰ Anna Dickinson, "Quantifying Religious Oppression: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Closures and Repression of Priests 1917-41", *Religion, State & Society*, Vol. 28, No.4 (2000)328.

³¹ Timothy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152。

³² Trevor Beeson, *Discretion and Valour*, 62.

³³ Timothy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152。

³⁴ 同上書。

³⁵ G. Alimov & G. Charodeyev, "Patriarch Aleksii II: I Accept Responsibility for All That Happened", *Religion, State and Society*, Vol. 20, no.2, (1992) : 241.

不過，無論沙基的原因如何，這份「效忠聲明」結果在 1927-28 年間，為俄羅斯正教會帶來歷史上最大的分裂，數十主教包括好幾位教會的高級教士，紛紛宣佈脫離莫斯科牧首獨立，亦有大量宗派開始獨立運作或成為地下教會³⁶，當中包括組成後來「真正統信仰教會」(True Orthodox Church)的彼得格勒都主教約瑟(Metropolitan Joseph of Petrograd)³⁷。

就是對外關係，俄羅斯正教亦因此被孤立。當時代表國外主教的卡羅夫斯議會(Karlovtzy Synod)領袖，都主教安東尼(Metropolitan Antony)便引哥林多後書六：14-15 回應，「光明和黑暗可以相通嗎？... 教會不能祝福敵基督的，更不能祝福無神政權。」除了引致卡羅夫斯議會跟俄羅斯正教的最後決裂，聲明亦使西歐巴黎都主教伊夫諾基(Metropolitan Evlogy of Paris)，無法與莫斯科牧首維持聯繫³⁸。

但諷刺的是，沙基所作的讓步妥協，並沒有為教會帶來可見的益處。斯大林(Stalin)在 1928 年推行他激進的五年計劃時，並沒有顧念正教的「效忠」，他的反宗教運動，力度只有更大，覆蓋亦只有更全面。

他第一輪的逼迫，集中減少全國地區教會組織，焦點亦從教會中央，轉移到地方教會。1929 年的宗教社團條例(Law of Religious Associations)，正是要強烈限制地方教會的活動，亦為以後大量關閉教會的行動，提供法律依據，使莫斯科牧首制，最後被削弱成一個只能維持基本運作的支架³⁹。

這時期的國家逼迫，沿用一貫共產政權的模式⁴⁰。恐嚇、監禁、放逐和處決，固然常見；關閉教堂、沒收教會財產、將大量信徒送往勞改營，亦彼彼皆是；而反宗教宣傳、遊說，更扮演重要的角色⁴¹。到了 1936-38 年的「大恐慌」(The Great Terror)，教會在全國的「大清洗」(purges)中，自然受更大逼害，而政府的注意力亦轉移到教會的中央高層，不少於 52 位主教、大主教和都主教在 1937-38 年間被殺，當中至少 40 人是被槍斃的⁴²。

³⁶ William Fletcher, "Reductive Containment: Soviet Religious Policy" : 492.

³⁷ Timothy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154。

³⁸ 同上書，頁 153。

³⁹ William Fletcher, "Reductive Containment: Soviet Religious Policy" , : 493.

⁴⁰ Trevor Beeson, *Discretion and Valour*, 62.

⁴¹ William Fletcher, "Reductive Containment: Soviet Religious Policy" : 493.

⁴² 同上書，頁 494。

但沙基又如何回應？他在這段期間作了很多謊言，例如在 1930 年的外國傳媒訪問中，聲稱在蘇維埃聯邦內，從未有宗教迫害，無疑是對千萬俄羅斯殉道者的殘酷虛假⁴³。他更嚮應政權，在 1935 年把神聖議會(Holy Synod)解散。

而到了 1939 年，莫斯科牧首制亦到達其低谷，當時只有少於四位主教沒有被監禁，而開放的教堂亦少於 500 間⁴⁴；雖然學者們對數字意見不一，但能確定的，是到了 1940 年，有 97.6%在 1916 年仍開放的教會，已被關閉⁴⁵。沙基的妥協，並沒有使教會脫離被摧毀的道路。

3. 1943-59 年世界大戰及戰後重建時期

世界大戰為俄羅斯正教帶來重建的契機，但原因卻不在教會的效忠，而同樣是國家的政治考慮。

事實上，早於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國侵略蘇聯的後一天，沙基已經發出教牧書函，號召信徒保護祖國、「分擔國家為生存而戰的考驗。」⁴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教會亦多方面協助國家抗戰，包括宣傳通訊、籌募軍費、照顧受傷/戰爭孤兒等⁴⁷。而在 1942 年，沙基更能以收集捐款為名，成功取得斯大林同意，為教會開立銀行戶口，這原是教會自 1918 年失去法人地位之後，所未容許的⁴⁸。

教會的努力似乎取得了政府的正面回應。在 1943 年 9 月 4 日，沙基和兩位都主教，獲得斯大林接見，會中亦達成了協定：斯大林終於准許教會選舉新牧首，而三天之後，在一個只有 19 位主教出席的會議中，沙基被選為新牧首。

這時，教會亦有機會進行重建工作，包括重開神聖議會負責行政工作、重建教區內主教、大主教和都主教的網絡，以及有限度出版教會刊物和開辦神學教育⁴⁹，但幅度卻是有限的；據 1945 年的資料顯示，當時其實有 5770 宗重開教堂的申請，但批准的

⁴³ Timothy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154。

⁴⁴ Serge Keleher, *Orthodox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oscow versus Constantinople*, *Religion, State & Society*, Vol. 25, no.2 (1997) : 128.

⁴⁵ Anna Dickinson, “Quantifying Religious Oppression: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Closures and Repression of Priests 1917-41” : 329.

⁴⁶ Dimitry Pospelovsky, “The “Best years” of Stalin’s Church Policy (1942-1948) in the Light of archival Documents” : 139.

⁴⁷ William Fletcher, “Reductive Containment : Soviet Religious Policy” : 496.

⁴⁸ Dimitry Pospelovsky, “The “Best years” of Stalin’s Church Policy (1942-1948) in the Light of archival Documents” : 140.

⁴⁹ William Fletcher, “Reductive Containment : Soviet Religious Policy” : 497.

只有 414 宗，有 3850 宗被拒絕、1506 宗還在審查階段⁵⁰，而教會亦始終未能開辦社會服務、青少年工作和兒童宗教教育⁵¹。

曾有學者認為，政府作出讓步，是由於教會戰時表現的忠心。不過可能性不大，因為教會遠自 1927 年，已經開始表達其效忠，但並無改變當時政府的逼迫。因此更有可能的，是斯大林希望利用俄羅斯正教，在國內向地下教會和大戰時親納粹德國的烏克蘭和波羅的海國家的教會作示範；而在國外，則協助國家將勢力拓展到東歐的正統教和斯拉夫國家⁵²。

而在 1948 年開始的冷戰時期，當蘇聯集中培養鼓勵和平氣氛時，教會亦樂意配合，積極參與「世界和平會」(World Peace Council)，協助國家宣傳，打擊西方。在韓戰前夕，這些宣傳尤為湊效⁵³。

可見，國家對教會的稍為寬容，不在教會是否妥協，而在於教會對政權有否利用價值。

4. 1959-64 年赫魯曉夫逼迫重臨時期

教會戰時和戰後對國家的服侍，並未使其從此離開政府的欺壓。當赫魯曉夫上台時，他發覺國內正蘊釀宗教復興的勢頭，而宗教似乎再度成為社會一鼓強大的力量。面對權力的威脅，教會的協助配合，便顯得微不足道⁵⁴，國家亦毫不猶疑地再牽起反宗教運動。

赫魯曉夫的逼迫，比之前的更為激烈，因為要配合其他範疇的「解放行動」⁵⁵，而到了 1960 年代，教會面對的壓力特別大，除了 1929 年的法令要嚴格執行之外，政府亦在 1962 年修改刑事法令，讓「以宗教儀式使個人或個人權利受侵擾」成為罪行，成為宗教迫害的借口。

除了共產政權沿用的關閉教會、暴力、恐嚇外，這次反宗教運動的特色，在於引進了一隊學者專家，為無神論提供學術基礎，亦在各地舉辦講座、跟信徒討論和做個人工作；加上科技進步，反宗教宣傳的媒介，亦由個人面談、印刷，推展到電台、

⁵⁰ Dimitry Pospelovsky, "The "Best years" of Stalin's Church Policy (1942-1948) in the Light of archival Documents" : 140.

⁵¹ Timothy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156。

⁵² Anna Dickinson, 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Reasons for the 1943 Soviet Church - State "Concordat", *Religion, State & Society*, Vol. 28, no.4 (2000), 337.

⁵³ William Fletcher, "Reductive Containment: Soviet Religious Policy" : 497.

⁵⁴ 同上書，頁 498。

⁵⁵ Timothy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157。

電視和電影⁵⁶，比斯大林時代覆蓋更全面；而整個運動對教會的破壞亦更大，除了大量神職人員被收監、送到精神病院、甚至淪為乞丐⁵⁷外，正教教堂的數字，亦由 1957 年的 13,477 間，急降至 60 年代的不超過 7,500 間⁵⁸。

但俄羅斯正教最為可悲的，是當政權不斷對其施虐時，仍甘心作宣傳工具，樂意為國家在國際舞台效力。隨着布拉格基督徒和平會議(Prague Christian Peace Conference)的產生，教會參與的國際和平宣傳有增無減⁵⁹，而當正教會在 1961 年加入普世基督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有機會與西方對話時，教會亦配合國家的「隱瞞行動」，對國內的鎮壓隻字不提，讓外界無法知道實況⁶⁰。

當赫魯曉夫下台時，俄羅斯正教在社會的角色，已極為模糊；一方面神甫只能在教會的範圍內舉行宗教儀式；而政府的打壓，加上牧首的妥協，亦令地方的神職人員與主教制的中央高層產生分裂⁶¹，偶爾牧首獲頒一些勳章或有機會出國⁶²，也只會成為受苦信徒的諷刺，教會在社會的見證，蕩然無存。

5. 1964-88 年反對運動的興起與結束

俄羅斯正教故事的吊詭性，在於牧首的妥協求存，只換來國家對教會的不斷蠶食和利用，而拒絕妥協的信徒、地下教會，卻得着靈性的復興。

赫魯曉夫下台後，教會與國家的關係處膠着狀態，政府關閉教會的行動突然停止，但教會亦未被容許重開教堂。政府再沒有任意對信徒使用武力，而拘捕或監禁的目標，亦集中在地下組織和公開抗議的活躍分子⁶³。

反而在俄羅斯正教內部，出現了反對運動(dissident movement)，成為這時期的特色。運動最重要的文件，是兩位神甫耶近寧(Eshliman)和英利文(Yakunin)在 1965 年 11 月，致牧首艾歷時的公開信，此信指出正教會多年來的問題：「很明顯俄羅斯教會是嚴重地病了，它的病來自在位的逃避履行他們的責任....正統教會一直承認國家領導

⁵⁶ William Fletcher, "Reductive Containment: Soviet Religious Policy" : 499.

⁵⁷ Trevor Beeson, *Discretion and Valour*, 73.

⁵⁸ John Anderson, "The Archives of the Council For Religious Affairs" , *Religion, State and Society*, Vol. 20, Nos 3&4 (1992) : 401.

⁵⁹ William Fletcher, "Reductive Containment: Soviet Religious Policy" : 500.

⁶⁰ Timothy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157.

⁶¹ Fr. Aleksandr Men, "The 1960s Remembered" , *Religion, State and Society*, Vol.23, no.2(1995) : 130.

⁶² Sandr Riga, "The Society of Ecumenical Christian Before and Afte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 *Religion, State and Society*, Vol.22, no.4(1994) : 382.

⁶³ William Fletcher, "Reductive Containment: Soviet Religious Policy" : 502.

公民生活的絕對權威....教會在位的，因為「與世界妥協」，已經背離了他們在基督和教會面前的神聖任務，亦違反了使徒的命令。」⁶⁴

信中最後要求牧首起來，終止國家的不法行爲。但教會的悲劇再一次發生，牧首無需國家的行動，便已經對兩位神甫作出處分，在翌年五月暫停了他們的職務。但此信已道出了信徒埋藏多年的心聲，亦讓教會從掩飾和虛偽中出來⁶⁵。

追隨兩位神甫行動的，還有小說家蘇凡尼先(Alexander Solzhenitsyn)，他見教會並沒有回應兩位神甫的公開信，便在 1972 年致函當時的牧首別文(Patriarch Pimen)，指出教會困境的諷刺性：「憑甚麼原因令人相信，根據無神主義者的指導，而對教會的靈性和身體作有計劃的「破壞」，就是對它的最好「保存」？「爲誰」拯救它？當然不是爲了基督。「用甚麼」方法保存？用虛假嗎？但在虛假過後，聖餐禮儀是在誰的手中施行？」⁶⁶

而在正教會以外，亦有一些反對組織成立，當中有宗教基礎的，包括由年青正教信徒組成，討論宗教和哲學議題的「宗教復興問題基督徒研習班」(The Christian Seminar on Problems of Religious Renaissance)，以及名爲「保護蘇聯信徒權利基督徒委員會」(Christian Committee for the Defence of Believers' Rights in the U.S.S.R.)，他們在成立之前，便已經發出聲明：「現在俄羅斯正教會的主教，和其他宗教組織的領袖...，都沒有致力保護信徒的權利，基督徒群體必須自己關注信徒的法律保障。」⁶⁷

這段時期亦看到反對派信徒的靈性復興。特別是在監獄和勞改營中，不同宗派的教牧和信徒雲集，彼此支持和分享，監獄就成了學習信仰的地方⁶⁸。當時更出現了「監獄文學」，描述反對派獄中的屬靈經歷：信徒在道德和靈性的掙扎中，重尋基督教的古舊傳統，操練出類似沙漠教父的靈性經驗，因爲監獄就像沙漠一般，讓信徒沒有其他依靠，從而保存生命和價值觀的完整⁶⁹，正如蘇凡尼先所敘：「當你放棄了「以任何代價求存」，監禁就開始奇妙地改變你的性格...你曾經是非常不寬容的、你常常

⁶⁴ Trevor Beeson, *Discretion and Valour*, 76.

⁶⁵ Timothy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158.

⁶⁶ 同上書，頁 159。

⁶⁷ Trevor Beeson, *Discretion and Valour*, 84-85.

⁶⁸ 黃國維：「赫魯曉夫政權下的俄羅斯正教」，【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三十七期(2004年7月)：205。

⁶⁹ Philip Boobbyer, "Religious Experiences of the Soviet Dissidents", *Religion, State and Society*, Vol. 27, nos. 3/4(1999) : 377.

都匆匆忙忙，常常缺乏時間，現在你擁有有趣味的時間... 一鼓有益的冷靜灌注你的血管..... 忍耐。」⁷⁰

自 1976 年開始，共產政權對反對運動漸趨嚴厲，而到了 1980 年，大部份領袖都已被鎮壓⁷¹。可惜在整個反對運動中，莫斯科牧首從未接納或保護這些運動，或跟反對派對話，而俄羅斯反對派孕育出來的宗教和道德傳統，也無法在正教會生根成長，以致到了蘇維埃共產主義崩潰後，俄羅斯正教會亦無法跟社會的道德靈性主流協調，在社會上被邊緣化⁷²。

1985 年，共黨總書記戈巴卓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以「開明」和「重建」為政策的主導，結束了政權對教會的鎮壓⁷³。箇中原因，當然同樣跟教會的妥協容忍無關。

D. 反思－該撒的歸該撒?

「正教分離」，常常是教會和國家希望達至的，但俄羅斯正教的經歷卻告訴我們，宗教和政治其實是分不開的，而正教會自沙皇時期，就從未能自政治漩渦中出來。當中原因，或許在於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影響着人民的意識形態，擁有龐大的動員能力，無可避免地會對政治形勢構成影響，亦容易讓政權(尤其是共產等極權統治)感到威脅。香港福音派的教牧，常稱「教會不參與政治」，或許只是一廂情願。

因此，教會需要思考的，是當敵對基督的政權，企圖對信仰強加限制，甚至有不公義的要求時，教會應該怎樣回應？無可否認，俄羅斯正教面對的，是令人同情的境況，就如謝魯哥夫神甫(Father Zheludkov)回覆穌凡尼先 1972 年的信件時指出：「現在有一個好像獨立石柱一樣政府系統。在其中心，卻是特別跟它陌生的組織：俄羅斯教會，要在一個已經完全被決定的環境中生存.....唯一給我們讓步的，就是在教堂內禮拜.....我們在這情況下，有甚麼可以做呢？....嘗試走這個政權無法接受的地下路線？還是跟這個系統作一些認同，然後盡用仍被許可的機會？俄羅斯主教制選擇了第

⁷⁰同上書，頁 378。

⁷¹ Timothy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159。

⁷² Philip Boobbyer, "Religious Experiences of the Soviet Dissidents", *Religion, State and Society*, Vol. 27, nos. 3/4(1999): 377.

⁷³ Timothy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160。

二個解決辦法。由此引伸出很多你有提到以及沒有提到的惡事，我們別無選擇.....。」

74

作為一個從未面對宗教逼害的人，筆者深明「針不到肉不知痛」的道理，亦明白理想與現實，往往有所距離。但基督教信仰所追求的真理，所盼望的天國，不就是理想的追求嗎？聖經又何曾接受「無可避免的罪」(necessary sin)，容許人因現實而放棄一些原則？

俄羅斯正教面對的，不單是生存抑或人命傷亡的選擇，背後更是忠於神和信仰抑或向魔鬼和世界降服的決定。正教會揀選了與世界妥協，結果是在政權步步進逼下節節敗退，喪失見證，為各界痛罵。

諷刺的是，當正教會「愛惜自己生命，就喪失生命」之際，千萬堅守信仰原則的俄羅斯信徒「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約十二：25)他們在逼迫之下，反而孕育出俄羅斯獨特的道德和靈性傳統，帶來宗教的復興，亦見證了耶和華是「留下七千人，未曾向巴力屈膝」的神。

事實上，蘇維埃政教關係的歷史，正正表明神才是歷史的主。教會以為人的理性作為，可以為教會消災擋難，卻只換來更大的欺壓。反之，眾人以為正教會一沈不起之際，神卻興起意外的歷史事件，為危在旦夕的教會帶來生機；當教會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之下面目全非，誰能想到會有世界大戰，讓教會有重建的機會？而教會經歷了七十年的共產敵對統治，士氣低落之際，亦有誰能預計戈巴卓夫的出現，或者蘇聯共產政權一夜之間的倒台？

既然神是教會之主，亦是世界和歷史之主，那麼該撒的物亦應是屬神的，而主耶穌關於「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可十二：17)的教導，亦應理解為在指斥該撒的像在銀錢之上，把自我絕對為偶像的做法⁷⁵。因此，該撒和神並非兩個不同的領域，反而該撒(國家)亦有服從神的主權，遵從神法則的責任。

所以當政權的行為違反神的主權和法度時，教會便有責任承擔先知的角色，指出政權的錯誤，要求當權者服膺神的法則之下。而俄羅斯正教的錯誤，正正在於把牧首制與政權完全認同掛鉤，喪失社會良心的角色；教會原應是社會合一的動力，卻成為宗教衰落的源頭⁷⁶，完全失去見證、失掉教會被建立的異象。

⁷⁴ Trevor Beeson, *Discretion and Valour*, 78.

⁷⁵ Dr. Roland Chia, "Rendering to Caesar: A Theology of Church-State Relations", *Church & Society*, Vol.7, no.2(2004) : 43.

⁷⁶ William V. D. Bercken, "Postcommunism *avant la lettre* : Russia's Religious Thinkers on Communism in

這些對香港教牧與中國政權的交往，又有甚麼啓示？筆者無意要求教牧公開指斥政府的宗教政策，到底現國內政權與蘇維埃共產主義，已經有很大差異。不過無可否認，現中國政權是以無神論為基礎的，對宗教亦始終保持「謹慎管理」的態度，所以當香港牧者跟國內官方機構交往時，是否亦應保持一定的醒覺，認清政權現對基督教所畫的界線、所作的規定，其實是規範的行爲？而當牧者有機會跟國內官員對話時，亦是否應承擔先知的角色，了解宗教決策者背後的動機，而非盲目樂觀，甘於按國家所定的遊戲規則而行？

俄羅斯千萬拒絕妥協的信徒，曾經向「不可為而為之」，結果是靈性的覺醒、宗教的復興，這些又可否成為穩定富裕但不冷不熱的香港信徒的啓示？

E. 總結

「我的心和靈魂斷然拒絕向死亡的裁決臣服，我被帶至喜樂當中，這是一個跟死亡不公平決鬥的獨特機會。這種感覺從熱切的禱告而來，當中我向神承諾執行祂神聖的旨意……當我作出委身時，我經歷了信心穩妥的感覺，這感覺至到今天，仍沒有捨棄我。」⁷⁷

這位受苦俄羅斯信徒的屬靈經歷，固然令人羨慕，但要有這樣的復興，必須先有承擔和付出，才能得着這肉眼未必能看見，卻是神真正的賜福。

1918” , *Religion, State and Society*, Vol.20, no.3&4(1992) : 352.

⁷⁷ Philip Boobyer, “Religious Experiences of the Soviet Dissidents” : 378.